

“译者行为研究”专题导语

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立足点的外化、动态、人本属性的译者研究,也是以译者行为为基点和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研究,还是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基点的行为过程研究,目前以批评研究最为成熟。不管是译者研究、行为研究还是翻译批评研究,在研究方式上,均呈现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研究,可概括为三大关键词:人本、动态、平衡。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直处于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这与翻译活动中译者行为无处不在的事实和译者行为研究“立足学术,对接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本栏目由五篇论文构成。周领顺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中回答了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涉及理论基本概念的辨析,第二类问题涉及研究中核心指标的量化,第三类问题涉及译者行为理论与研究的关系。这些问题均指向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关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创建者有必要在发展过程及时释疑,以使研究及其理论建设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王峰等利用语料库等科学的工具,针对译者行为批评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科学的量化和分析,加上缜密的理论思辨和概念的提,使理论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关于量化的问题,周领顺在文章中也给予了简要回答,讨论开诚布公,共同表现出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许明武等和赵秋荣等都讨论了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的互动关系,而赵国月等讨论的是译者的社会性和行为的社会化。译者行为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维度,研究者结合事实,扎实研究,细致分析,从不同侧面使译者行为理论得到了完善,为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持续发展的良好保障。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

——答研究者(之三)

周领顺

(扬州大学 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本文基于姜淑芹教授和王峰教授之问,回答了涉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三类代表性问题。第一类问题涉及理论基本概念的辨析,第二类问题涉及研究中核心指标的量化,第三类问题涉及译者行为理论与研究的关系。这些问题均指向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关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创建者有必要及时释疑,以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应用;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1-0084-13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周领顺,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者行为研究。

引用格式: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J].外国语文,2024(1):84-96.

0 引言

“译者行为研究,特别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的行为研究正处于蓬勃的发展期”,“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自我更新外,理论构建者还应及时梳理、及时释疑、及时学习,并对阐释不足之处及时澄清”(周领顺,2023a:6),这样做更有利于理论的建设及相关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文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系列的“答研究者(之三)”。“答研究者(之一)”主要回答了“有关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理论归因和理论应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皆为研究者公开发表文献中涉及的问题;“答研究者(之二)”主要回答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优势凸显化”“分析层次化”和“概念细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众多听众对笔者学术讲座内容的提问,因讲座时间所限,笔者不能当场给予充分的回答”(周领顺,2023b:62)。本文将主要回答其他研究者私下与我讨论的相关学术问题,前两个问题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姜淑芹教授和山东大学王峰教授的两类问题为代表,后一个问题涉及译者行为理论与研究的关系,以王峰教授等学者的讨论为引子。

姜淑芹教授的问题是:“‘求真—务实’的译名为什么是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呢?‘求真’是对原文的求真,为什么是 truth,而不是 faithfulness 或者 fidelity 呢?”姜教授的问题涉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概称“译者行为理论”)基本概念的辨析。基本概念是理论研究的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王峰教授讨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有关“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简称“三度”)在研究上的量化,这是全新的尝试。他设置的“译者行为批评量表”如下:

维度1——求真度:

- (1) 译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字面意义。
- (2) 译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隐含意义。
- (3) 译文能够完整再现原文的概念意义。
- (4) 译文能够完整再现原文中的人际意义。
- (5) 译文能够完整再现原文中的语篇意义。
- (6) 译文能够完整再现原文中的逻辑意义。
- (7) 译文能够完整再现原文中的文化意义。

维度2——务实度:

- (1) 译文为了充分的可读性变更原文的意义。
- (2) 译文为了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变更原文的意义。
- (3) 译文能够根据目标语境的文化需求变更原文的意义。

- (4) 译者能够根据目标语境的体裁特征变更原文的意义。
- (5) 译者能够根据译者本人的认知基础变更原文的意义。
- (6) 译者能够根据译者本人的认知基础树立译文的独特风格。

维度3——合理度:

- (1) 译文既能保持与原文意义一致,又能够保持译文的自然流畅。
- (2) 译文既能保持与原文意义一致,又能够保持译文的体裁规范。
- (3) 译文既能保持与原文意义一致,又能够满足译文的读者需求。
- (4) 译文虽然偏离了原文意义,但能够保持译文的自然流畅。
- (5) 译文虽然偏离了原文意义,但能够保持译文的体裁规范。
- (6) 译文虽然偏离了原文意义,但能够满足译文的读者需求。
- (7) 译文虽然偏离了原文意义,但能够满足译文的市场推广。
- (8) 译文虽然偏离了原文意义,但能够树立译者的独特风格。

在研究上量化,目的在于提高理论具体运用时的操作性,借以检验理论的应用效果。两类问题虽然不同,但都是关于如何进一步细化译者行为研究的,不背离“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初衷,皆有专题讨论的必要。

1 基础理论概念辨析问题

关于姜淑芹教授的问题,笔者曾经针对“‘求真’会不会是‘忠实’的翻版呢?‘求真’和‘务实’与道安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是不是也差不多呢?”这样的提问作了简要的回答(陈静等,2022:7-8)。有关问题仍有回答的必要,至少我在此前尚未讨论过为什么要用 truth 取代“忠实”以及“忠实”和“求真”各自所在的范畴。以下的回答尽量少重复以往的观点,不仅答疑,也兼及相关的其他问题。

“忠实”和“求真”虽然都是译者翻译时的指导思想/原则,但“忠实”只是靠近原文的翻译态度,在译文上呈现为结果状态,在研究上呈现为静态分析问题的方式。传统所说的“紧扣原文”即“忠实”,这是译者对自己的基本规定,但从译评者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却做不到全面、客观和科学。“忠实”和“求真”分属两个范畴,范畴不同,内涵必然存在巨大差异。Faithfulness、fidelity 或“忠实”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因此常用作译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规约,且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所以主观必然是它的主要特征。而 truth(真相)属于客观事实范畴,不管译者能不能发现真相,真相却始终安居不动,所以 truth-seeking(“求真”)是求真于过程,正如周领顺(2023c)论文《求真于过程:译者行为理论的翻译实践解读》题目所显示的一样。在逼近全部真相的过程中,会发现阶段性、聚焦于某一问题的真相和为了某一目标的需要而付之一用的事实,所以客观是它的主要特征。客观与主观相对,比如借用“求

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于译者行为倾向性的验证,其分析手段和方法是客观的,这与主观判断和先入为主的经验性做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客观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未必能得出完全客观的结论。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语料库手段是客观的,但分析还要靠人一样,这仍难免存在主观的一面。顺便一提的是,utility 所表示的“实”是与翻译目标一致时达到的状态,比如一般意义上外宣翻译最大的实是宣传效果,商业翻译最大的实是盈利,文学翻译最大的实是愉悦于人。这些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实随目标而动,为保持动态平衡,在目标条件的导向下会发生转化。

当以文本为中心并在“行为—文本视域”看问题时,“求真”求的是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之真;当以社会为中心并在“行为—社会视域”看问题时,“求真”求的是原文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实之真,比如翻译“鱼香肉丝”菜名时考虑其与“鱼”的关系,“忠实”只面对原文语言呈现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忠实”表现为“该不该”(靠道德伦理约束),“求真”表现为“是不是”(靠客观事实显化)。译者单方面约束自己行为的“忠实”在真实的翻译过程中难免主观,而在译者行为理论提倡的“求真”和“务实”的双向约束下,译者才会尽可能做到客观,译评者也才可能会比较客观地呈现翻译的真实生态。在“行为—文本视域”,译者被明确为语言转换和意义再现者;在“行为—社会视域”,译者被明确为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可见,“译者”已经从狭义走向广义。超越语言文字负载的意义之外的“求真”是社会性求真,其意义隐藏于语言背后;超越语言文字负载的意义之外的“务实”是社会性务实,其结果是社会化的产物。在“行为—文本视域”,描写译者行为的是“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超越该评价模式约束和描写的译者行为属于“非译”^①行为。但是,在“行为—社会视域”,因为译者被明确为意志体,而意志体又包括译者及其背后的国家、机构、经营方、利益方等代表的意志,所以“译者”的范围得到了扩大。

这一切归根结底反映了译者身份之杂,而译者身份之杂又反映了翻译活动之复杂。即使译者为迎合社会的需求而偏离原文的意义,最终也都是由错综复杂的译者身份引起的。当然,译者身份的复杂是内在诉求与外在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谁在“求真”,谁在“务实”?求了什么“真”、多少“真”?务了什么“实”、多少“实”?执行了谁的意志?其他意志体与译者是什么关系?调和的过程怎样?某意志体的主观诉求是什么?什么样的外在因

① 关于“非译”(非翻译),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方梦之(2022:3)解释为“不属于翻译行为,其间没有发生不同文字的转换。‘非翻译’具体包括‘零翻译’‘音译’‘移译’‘转写’等。‘非翻译’策略的使用,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跨文化交流效果。”冯全功(2022:11)作了新的反思:“周领顺把译和非译视为连续体的关系,把是否‘再现原文意义’作为衡量标准。这两个概念在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体系中毫不起眼,却在笔者的脑海中翻腾了好几年。到底什么是翻译?我们又该如何界定翻译?”冯全功(2022:18)评述道:“语篇翻译(批评)观本质上是一种整体观,整体质大于局部质,局部也会染上整体的性质,类似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完形组织法则。从这种意义而言,周领顺所谓的‘译’与‘非译’从语篇视角来界定会更具合理性。”两位学者角度不同,似可总结为,方梦之倾向于技巧,冯全功倾向于语境。

素对译者产生了影响?“求真”是围绕原文和讲话者的意义的;“务实”是面对社会的,而社会又主要涉及读者、市场和具体的社会(如一个社团)。讨好读者、创造市场利益、赢得社会名声等都是“务实”行为。读者喜欢可读性强的作品,译者就努力去实现,毕竟是原文意义内部的东西,是可控的,而创造市场利益、赢得社会名声等超越了原文的意义,属于原文和译文共同产生的作用,所以需要将“务实”分为内部(译内务实)和外部(译外务实),但总体上都是译者身份下或者非译者身份下译者的社会务实之为。

“求真”和“务实”之间充满了辩证性,二者相互制约,在翻译事实上难以穷尽。在微观上,可以在事实上将“求真”(求意)和“务实”(求用)分为两大阵营,当然还有中间状态事实的存在。在宏观上,在目标导向下,二者又都是务实的,“务实为上(用)”的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微观上的“求真”也是宏观上的“务实”,这既是分层次看问题,也是辩证思维,更是译者社会性和翻译社会性使然。就个人而言,比如葛浩文的“求真”就是“务实”,因为他来自目标语市场,其译文不会构成交际障碍,这是执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前提,而我国译者外译时坚持的“求真”未必能如愿,皆因不是目标语读者,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所以葛浩文坚持求真的译文,我国译者却选择回避(周领顺等,2022:92-93)。

“求真”是译者的天职,但译者的天职还有“务实”作补充,正如历史上既有“求真”,也有“喻俗”一样。只是“喻俗”名为读者实为作者,是帮助读者领会原文的精神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是传统观念中以文本为中心的大背景所限定的。“喻俗”要求译文大众化,只可能是务实于社会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梁启超在阐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时提及他主张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梁启超后来在《变法通议》中又做了深入阐释:‘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周领顺等,2015:11),说明求真仅限于语言一维。许渊冲(2000:2)有“求真”和“求美”之说。他对于二者的关系论述道:

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如果真与美有矛盾,那不是为了真而牺牲美,就是为了美而失真。如译的似的诗远不如原诗美,那牺牲美就是得不偿失;如果译得“失真”却可以和原诗比美,那倒可以说是以得补失;如果所得大于所失,那就是译诗胜过了原诗。

可见,除了语言一维外,翻译更是对于风格的追求。从翻译的角度讲,“增强文学性是‘求美’的过程,它和‘求真’(传信)是辩证的关系,‘求美’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但必须以‘求真’(传信)为基础”(周领顺,2019a:177)。二者并不矛盾,“庄子所谓‘大美’,其实跟他所谓‘真’是相通的”(徐克谦,2005:213)。总之,梁、许说的是译者的行为,而我所说的是研究译者的研究者之所为,这是根本的不同。或者说,梁、许说的是翻译实践上的求真,我说的是翻译批评上的求真。

目标导向下的求真行为全都是务实行为。而译者行为理论中的“求真为本,务实为用

(上)”原则表明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尽管“求真”和“务实”在表面上属于两个阵列。在译者行为的过程中,目标因素是制约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而所谓动态平衡,取决于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文本意义是基点,处于底层;目标因素是引力点,处于上层。中枢执行者是意志体译者,其意志通过行为得到贯彻。也就是说,动态平衡是以文本意义为基础而在翻译目标导向下所表现的运动状态。

以上回答的不仅仅是“忠实”和“求真”的问题,也兼答了与“求真”相互制约的“务实”问题。关于“忠实”和“求真”,主要的区别是:

(1)“忠实”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或标准,是静态的,单维的,是译者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道德伦理约束;“求真”和“务实”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或标准,二者互相兼顾,并由“务实”约束,“求真”和“务实”在翻译目标拉动下保持动态平衡。

(2)“忠实”是评价翻译实践的原则或标准,是对于结果(产品)的评价,是翻译质量评价,多表现为主观,不能客观反映翻译活动的真实生态;“求真”是评价翻译实践的原则或标准,注重于译者行为过程的描摹,多表现为客观。

(3)“忠实”面对原文,以文本为本,重静态和结果;“求真”和“务实”(包括“求真-务实”)面对译者及其代表的意志体,以人为本,重意志体、过程和动态。

2 核心指标量化问题

王峰教授讨论的是三“度”(求真度、务实度、合理度)的量化。关于“求真度”,王教授的第(1)(2)条所指的意义是词汇学上的意义,第(3)(4)(5)所指的意义是功能语言学上的意义,第(6)(7)条所指的意义是一般意义上的意义,难以穷尽,不能以逻辑约束。

译者行为批评有外化性、人本性和动态性三大属性(周领顺,2023d),在译者行为研究上体现为三大研究路径(文本+人本、译内+译外、静态+动态),那么研究也主要由这三大路径延伸出去,通过译者求真和务实的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就有了文本意义和人本意义(如作者等人的意义)、形式(外在)意义和内涵意义、静态字面意义和动态语境意义。鉴于译者是行为的主体和研究的基点,还有一个译者意义,即译者的目标意义,它不是原文的,而是译者借翻译实现的。传统所说的意义,主要说的是原文传达的意思,奈达的“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中的 meaning 说的就只是内容的正确,但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比如风格所属的形式意义就未包括在内。后来,奈达完善了自己的说法(周领顺,2014:18)。另外,因为总体上传统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是在文本视域看问题,所以忽略了语境、文化联想、译者参与以及一切“非正法”翻译实践所产生的意义。

我上文所说的意义还主要是在“求真—务实”连续统的范围内、在“行为—文本视域”下看问题,在这之外还有一个语言所负载意义背后的意义,可称为意义外的意义,它不存在

于文字表面,也不蕴含于内容之中,而是存在于文字背后与事实相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超越了“求真—务实”连续统的范围,需要转移到“行为—社会视域”看问题,它不是能够通过翻译实践上的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等翻译策略和“忠实”翻译观/思想/原则就能实现的。

文本意义的构成较复杂,细分有七种,概括为两类:第一类意义是字面意义或语义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这是文本的基本信息或意义,对它们的理解应当严格按照语法等语言学规则进行;第二类意义包括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和反射意义,这些意义的内容不是语言符号系统内的规则所规定的,而是反映着作者的情感和意愿,强调个人人生经验和体悟,表达着作者的交际意图,这种意义因人而异,故在语用学中称为话语含意,以区别于含义,即直显的语义意义。(陈开举,2023:184)

鉴于各种差异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求真”都难以实现原文和作者意义的全部,甚至译者因为主观目标和客观因素的限制,也并不都希望再现原文和作者意义的全部,因此就可以问出“求”了什么意义之“真”这样的问题。在译者行为理论视域,“求真”针对的意义不是常规的,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

(1)文本意义和人本意义(由“文本+人本”路径达成)。文本呈现的意义和作者等意志体的意义未必一致(如口译员居中扮演调停人角色时传达的意义)。

(2)形式(外在)意义和内涵意义(由“译内+译外”路径达成)。形式包括修辞、风格等。

(3)静态字面意义和动态语境意义(由“静态+动态”路径达成)。静态字面意义主要通过词汇和句子的意义显现出来,进入语境便成为动态的过程意义。语篇构成的是语境意义。

(4)译者意义或译者的目标意义(译者作为意志体,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一并传递自己的意志)。

(5)意义外意义(在“求真—务实”连续统的范围外、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看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6)意义达成度(不同等级的“求真”,即“求真度”)。

关于“务实度”,王教授设计的前五条有一个核心表述,叫“变更原文的意义”,但为什么要变更原文的意义呢?另外前三条的主语是“译文”,而译者行为研究中的主体是“译者”和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也常以主语面目出现。

“务实”分为译内务实和译外务实,译内务实不更改原文的意义,比如提高译文的可读性,限于语言层面。但是,可读性的前提是原文本来就拥有可读性,所谓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只是说要等值把译文表达到位,使其也能打动目标语的读者。当原文不具备可读性而译文

故意为之增强其可读性时,这则是译外务实,因为故意更改原文的形式意义是为了使译文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等需求,是通过求用而务实的。求用皆为务实,只是需要分清哪些是译内的哪些是译外的,还要阐明原文的条件,才能证明是不是更改或偏离。务实是目标导向的,与合理度有重合之处。

第五条“译者能够根据译者本人的认知基础变更原文的意义”和第六条“译者能够根据译者本人的认知基础树立译文的独特风格”均未设置“目标”因素,只有设定了特定的目标才能判断是否有务实的预期和结果。第六条即传统所讲的译者风格,应归为“求真度”里的“译者意义”,置于此除非出于讨论“求用”的需要。归根结底,务实度主要是这样几种:

(1)译者为了提高译文可读性而不改变原文意义的译内务实(限于译者和语言,不涉及其他意志体和语言外因素)。

(2)译者等意志体为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目标而改变原文意义的译外务实。

(3)译者等意志体为了自己的务实目标而选择性求取原文意义和译文意义进行的创造性务实。

(4)译者等意志体为求取历史、文化和社会之真而实现超越原文务实目标之外的务实(如厚翻译)。

(5)务实达成度(不同等级的“务实”,即“务实度”)。

关于“合理度”,讨论“求真度”和“务实度”的指标都是分项讨论的,但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求真”和“务实”相互制约,倾向性随目标而动,而只有达到与务实目标一致的平衡状态,才达成了高合理度。所以,讨论“合理度”,就必须对“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作并合讨论。

“求真”和“务实”倾向于达成的过程,只有合理度才是最终的状态和评价标准。“合理度”“求真度”和“务实度”呈三角关系,合理度在上层,求真度和务实度是基点。文本类型是一个重要指标,它与目标因素相互制约。合理度可以作如下总结:

(1)偏于高求真度的高严肃度文本类型(如学术论文)+求真目标(如用于语言对比)=高合理度。也可表述为:求真型翻译(如英汉对照)+求真目标(如用于语言对比)=高合理度。

(2)偏于高务实度的低严肃度文本类型(如小说、电影)+务实目标(如为了娱乐)=高合理度。也可表述为:务实型翻译(如广告翻译)+务实目标(如为了盈利)=高合理度。

即是说,与务实目标一致的行为是平衡行为,前提是要在其该在的视域(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行为—社会视域)看问题。比如,为了语言对比而求真于原文的意义,就要在“文本—语言视域”中看问题;为了市场利益而偏离原文的意义并根据市场需求而

调整的,就要在“行为—社会视域”中看问题。与务实目标不一致的行为是失衡行为,“求真”和“务实”相互脱离的也是失衡行为,比如面对儿童读者而求真于原文生涩难懂的意义并使之求真再现。三“度”之间的各种中间状态,详见周领顺(2019b:121),最终综合平衡为“合理度”。

其他需要量化的核心指标还有“渐变状态”的阶段特征、“接受度”“偏离度”“平衡度”等,都需要研究者在事实中验证。

3 译者行为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王峰等(2023:99)写道:

译者行为批评作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迄今已经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本文认为该理论要进一步发展,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1)聚焦原文特有翻译问题,而不是模糊混沌的整体评价。(2)综合微观与宏观的双层评价,描写和解释“微观务实,但宏观求真”,“不同译者求真分化”等特殊现象。(3)关联译者不同时期的行为轨迹,更加立体化地解释译者行为发展特征。

理论的深化发展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王峰等学者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就问题本身而言,这些问题或许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首先是把“译者行为批评作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看待的(王峰,2023:99)。理论和具体的研究彼此相关,但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

理论是导向性的、框架性的、纲领性的,是反复验证、抽绎和升华的理性认识结晶,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无须面面俱到,而需要做到面面俱到的是理论指导下的研究。研究不仅需要验证理论,还需要细化理论,更需要面对新出现的事实而作进一步的解读,从而完善理论,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理论属于认识范畴,具有抽象的特征;研究属于实践范畴,更加具体。即是说,理论不管操作(研究、实践),尽管能够指导操作。以连续统(连续统一体)为例,从理论上讲,“由于‘连续统’本质上表现的是不对抗、不割裂,是连续的、渐变的和中间状态的特征,所以严格地讲,泾渭分明的‘x段式’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x段式’之说既不是理论上能规定的,也不合‘连续统’的真谛,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上”(周领顺,2023a:16)。具体而言,在理论范畴里有理论属性和概念系统,在研究范畴里有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它们都是理论具体化后的产物,构成总的研究方法论(周领顺,2023d)。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指理论本身的问题,比如从原来的评价模式发展到现如今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当然,该评价系统也可以兼做评价模式和分析框架。周领顺(2023a:19-20)对于理论的发展是这样描述的:“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理论系统—应用系统—评价系统(即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研究、译者行为评价)’三位一体宏观建设的基础上,研究者可着力开展

‘评价系统’之‘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层次化分析框架的建设和应用,同时兼顾对翻译实践的指导。”

理论建设在宏观指导层面,研究在微观事实层面。译者行为研究未来大的发展实际早已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字面上得到了暗示,即“译者研究”“行为研究”和“批评研究”。概括起来讲,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和研究的理论特征如下:

理论属性:“外化性”“人本性”“动态性”;

概念系统:“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译内效果”“译外务实”等;

研究路径:译内与译外相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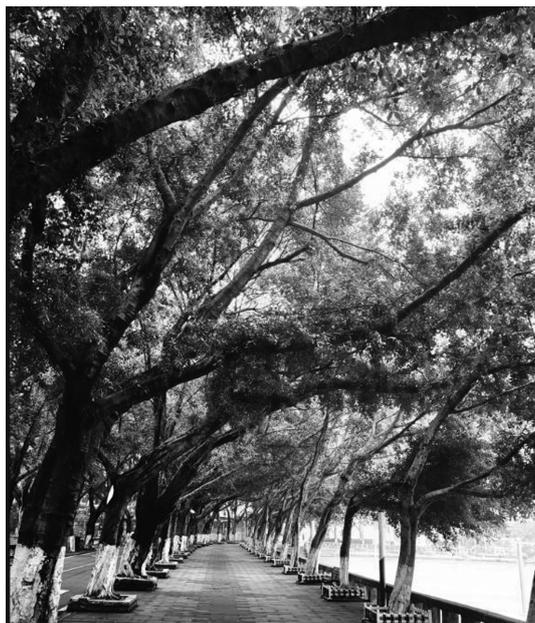
研究手段:“求真”“务实”和“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译文等各类连续统、“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等三“度”“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或评价模式、语料库等;

研究方法:涉及众多意义划分的“层次分析法”“译内译外分析法”以及与外化性相关的“翻译内外层次分析法”、与动态性相关的“互动关系分析法”、与人本性相关的“人本位分析法”、三大视域融合发展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法、视野延展并聚焦的“视域视角转换分析法”、定位动态平衡的“目标导向分析法”和基于人本、过程的“身份角色转换分析法”等。

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立足点的外化、动态、人本属性的译者研究,也是以译者行为为基点和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研究。不管是译者研究还是翻译批评研究,在研究方式上,均呈现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研究,可概括为三大关键词:人本、动态、平衡。其中,维持动态平衡的是文本意义和目标因素的相互制约。周领顺表述为“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社会性和社会化、意志和行为、行为和译文、译文和社会、行为和社会等等各元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网络”(陈静等,2022:4),这是动态研究的典型特征。为了说明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关系,周领顺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静态地研究一颗星星,你就研究它的直径、质量、构造等,而研究它在轨道的情况,你就要研究它的速度,与其他星星的关系,自转和公转周期,这就成了动态的,连快和慢都成了相对关系。在翻译上,它呈现的是各种元素在“活动”“语境”或“社会”中的关系,从彼此间动态的关系可以发现真实的意义。(陈静等,2022:3)

“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研究”这一表述涉及两个焦点,一个是“以人为本”,另一个是“互动关系”。“以人为本”与传统上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做法相对,这是“文化转向”后的主流研究范式,译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互动关系研究,却是译者行为研究所特别主张的一个研究理念。为了更立体地说明译者行为研究以人为本的动态关系理念,我以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园内操场边的两行榕树为例:



这两行榕树整齐划一地均朝向操场一边倾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风、其他高大树木遮阳和操场一边的空旷空间,它们之间呈现为互动关系。本来,倾斜意味着失衡,但失衡后又走向新的平衡,达到了整齐划一。而太阳是从失衡走向新的平衡的最大引力点,它如同翻译活动中的目标因素一样,呈现中心导向。与译者行为批评相结合看问题,文本意义(文本类型等)是一般状态(常态,如树之挺拔向上状态),动态平衡是运动状态(特殊状态,如树之倾斜状态),平衡与否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有规律地保持某种倾斜状态,一定是目标因素(如太阳的吸引)使然。在大千世界中,互动关系的极致状态便是九九归一后所维持的新的平衡,从平衡到失衡再到新的平衡,说明动态关系中会出现各种条件的转化,常表述为“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发生转化的”,虽然条件有多个,但维持新的平衡的一定是中心因素(如翻译活动中的目标因素)发挥了引力的作用。在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翻译活动(translation as a social activity)中,各种因素之间(不限于两两之间)的互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仅作静态的分析,就会对某些因素视而不见,难以实现翻译批评的全面、客观和科学。所以,互动关系分析法和目标导向分析法就会成为动态研究的个性方法。

译者行为理论指导译者行为研究,而译者行为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基础研究,除了服务于直接指向的研究领域外,也间接服务于相关的“翻译社会学”“翻译应用研究”等研究领域,译者行为研究可以看作这些研究的一部分,比如王亚等(2023)就将“译者行为研究”包容在“译者研究”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活动执行者译者及其行为无处不在,而“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缘模糊的”(莫兰,2023),也注定了无穷的研究内容。但涉及的这些相关研究领域均缺乏清晰的边界和概念系统,暂不具备独立的个性特征,整体

尚处于构想和建设之中。所以,一旦译者行为研究各个分视域(“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的理论建设逐步做强、做大,其包容力必然会得到增强,最终做成包容性更强的上位学科研究领域,这也并非无根据的空想。

4 结语

关于理论概念的解释,因各理论的视角不同,使用范围不尽一致。当在译者行为理论的系统内解释时,不必生硬套用其他理论中的术语进行对等转换。比如,认为“直译”(直接求真)就是全部的“求真”是有偏颇的,因为“意译”也是向原文意义“求真”的一种做法(曲线求真),只是“意译”兼有提高可读性、迎合读者的一面,所以更多带有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与相应的效果。

关于研究的总路径和个性化研究方法,译者行为批评规定的研究具体由三大研究路径(译内与译外相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构成,但“译者行为研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又是研究的总路径,“译者行为研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基本内涵相同,大体上讲,加上“批评”字眼,就多了批评的目标,以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总目标,二者都含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方法内涵。目前,研究者未对二者作严格的区分,两种称谓共现,称“译者行为研究”的有李正栓等学者(2022)《许渊冲译者行为研究》、滕梅等学者(2023)《国内自译群体译者行为研究》,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的有康宁(2022)《中央文献先例叙事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习近平讲故事〉俄译为例》、林宗豪等(2022)《〈天工开物〉三英译本作者“误见”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周领顺等(2021)《葛译乡土语言比喻修辞译者行为批评分析》、周领顺等(2023)《唐人送别诗群体译者行为批评分析》等。伴随着总路径的是个性化研究方法。本文多次提及的三位一体的“文本—行为—社会”之说具备了宏观上的理论发展系统和“批评研究”的评价系统,中观上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以及微观上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三个功能。这些均将另文展开。

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的理解是常态,只有在差异中才更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才能使研究得到更有效的发展。“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自我更新外,理论构建者还应及时梳理、及时释疑、及时学习,并对阐释不足之处及时澄清”(周领顺,2023a:6),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愿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及时提高认识,更新知识,共同为理论的完善和研究的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 陈开举. 2023. 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J]. 中国社会科学(2):183-202.
 陈静,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和新思维——周领顺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1):1-11.
 方梦之. 2022. 译学术语中的同名异义[J]. 外语与翻译(2):1-4.

- 冯全功. 2022. 翻译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关于翻译定义的若干思考 [J]. 中国翻译(3):11-19+191.
- 康宁. 2022. 中央文献先例叙事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习近平讲故事》俄译为例 [D]. 天津: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正栓,张丹. 2022. 许渊冲译者行为研究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3):25-37.
- 林宗豪,王宏. 2022. 《天工开物》三英译本作者“误见”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J]. 上海翻译(6):73-79.
- 乔·莫兰. 2023. 人文学科的本质是跨学科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6-09(7).
- 滕梅,杨君宜. 2023. 国内自译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51-65.
- 王峰,刘克强,张胜捷. 2023.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功能性人物叙事英译研究——以《西游记》小妖称名为例 [J]. 外语教学(4):95-100.
- 徐克谦. 2005. 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 [M]. 北京:中华书局.
- 王亚,文军. 2023. 国内译者研究 30 年:现状与展望 [J]. 外国语文(4):121-130.
- 许渊冲. 2000. 新世纪的新译论 [J]. 中国翻译(3):2-6.
- 周领顺,高晨. 2021. 葛译乡土语言比喻修辞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5):102-110+161.
- 周领顺,孙如莹. 2023. 唐人送别诗群体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J]. 山东外语教学(2):89-102.
- 周领顺,赵国月. 2015. 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 [J]. 上海翻译(4):9-14.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2019a. 意译:文学性增强的有效途径 [J]. 中国翻译(4):173-177.
- 周领顺. 2019b.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 [J]. 外国语文(5):118-123.
- 周领顺,等. 2022.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行为批评研究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领顺. 2023a.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一)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6-23.
- 周领顺. 2023b.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二)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4):62-71.
- 周领顺. 2023c. 求真于过程:译者行为理论的翻译实践解读 [J]. 中国翻译(5):176-180.
- 周领顺. 2023d. 探析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属性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6-27(7).

Questions Concerning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nd Its Applications: Answers to the Researchers (III)

ZHOU Lingsh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Professor Jiang Shuqin and Professor Wang Feng, the author, the initiator of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nswers three types of typ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The first type concerns the discrimination of some basic concepts, and the second type the quantification of certain core index and the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These types of questions lead to the further refinement of research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Doubts need to be cleared by the initiator of the theory in time so that the theory could be developed in its right way.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责任编辑:龙丹